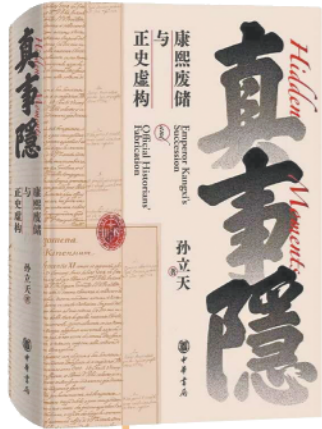


剥开历史的洋葱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本报实习生 金蓉

今年年初，历史学者孙立天所著《真事隐：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一出版，便备受关注。书名“真事隐”取自《红楼梦》开篇人物“甄士隐”与“贾雨村”，两者谐音意有双关——“真事隐去，假语存焉”。作者意在传达康熙废储之际的历史真相已被权力刻意遮蔽，官方史书所载不过是经过粉饰的“假语”。从传播效果看，此举极具巧思。它巧妙勾连国史级文学经典，迅速唤起公众对史书记载与历史真实的深层思考。



《北京纪事》成为利刃

初读《真事隐：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，似在剥洋葱一般。作者并不急于抛出结论，而是将“案发现场”和盘托出：面对同一场康熙朝废储风波，两份关键“供述”——清宫官方编纂的《清实录》与耶稣会传教士纪理安所著《北京纪事》，大致提供了相似的主线，时间、地点基本吻合，在人物动机、事件逻辑乃至细节描述上却彼此矛盾。

洋葱的最外层，是坚硬而光滑的表皮，恰如《清实录》所载权威历史。作者首先指出，这部由雍正帝授意编纂的“正史”，其根本目的不是记录，而是合法性建构。它将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简化为忠奸对立的道德剧：皇四子（即雍正帝，下同）被塑造为沉稳可靠的贤王，而皇八子则被描绘成结党营私的野心家。这一层的“真实”是服务于胜利者的政治需要，而非历史本身。作者的切入点极为关键：承认正史的“虚构性”是探寻真实的第一步。

正如刑侦现场勘查教科书所述，所有行为皆有其痕迹。剥开历史洋葱的表皮后，我们接触到的是多汁但刺激的内层。作者在此引入了核心的外部证据——传教士纪理安的《北京纪事》。这份史料的价值在于其三重独立性——

从时间上看，《北京纪事》的记录发生在事件进行时；纪理安在书写时，并不知道太子会被复立，更不知道最终是皇四子胜出。这使其彻底摆脱了“后见之明”的干扰；

从立场上说，作为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，他们虽身处权力中心，却非清朝政治利益的直接相关方，他们的观察基于日常接触；

再就是传播渠道，该文献因观点不被罗马教廷认可，长期尘封于教会档案，未被公开刊行，因此未受到清朝官方话语体系的污染。

以上种种原因，使得《北京纪事》成为一把利刃，足以划开《清实录》隐藏的历史细节。

在书中，作者逐条比对、层层剖析：哪些关键情节在官方记录中被刻意删减？哪些措辞经过反复修饰以服务于特定叙事？哪些说法因不断转引而被误认为“共识”？又有哪些沉默本身恰恰构成了最有力的反证？

这种阅读的张力，并非来自猎奇或秘闻，而源于一种更为冷静的智性。读者可以看见权力如何系统性地剪辑过去，正史是如何被虚构的；同时也看到，另一束来自异域档案的微光，如何照亮这精心编织的叙事边缘，暴露出其接缝与裂痕，映射出更为立体、复杂的雍正皇帝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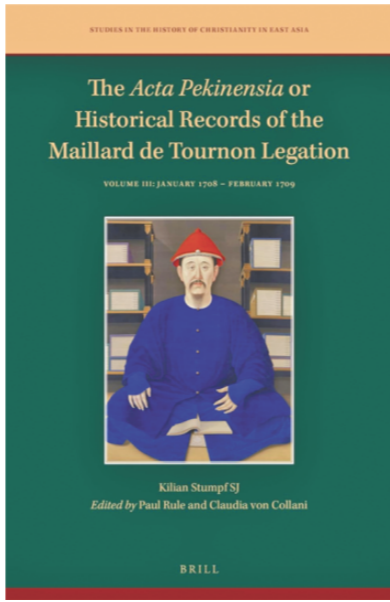
多重力量酿成悲剧

在书中，作者并未泛泛分析两份史料的文本差异，而是精准地抓住一个决定性的细节：康熙第一次废黜太子的真实动机。

长久以来，关于康熙皇帝为何在1708年突然废黜其亲手培养了三十余年的皇太子胤禛，历史学界和大众普遍接受一个基于《清实录》的叙事框架：太子因长期骄奢淫逸，结党营私，加之在塞外行猎期间对病重的皇八子表现冷漠，并有“帐殿夜警”——每夜窥探康熙御帐、意图不轨的骇人行径，最终令康熙忍无可忍，愤而废储。这一解释将废太子事件描绘成冰冻三尺、非一日之寒的必然结果。

然而，在本书中，孙立天通过爬梳《北京纪事》，为读者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。该书认为，康熙废太子并非源于太子的罪行或父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而是一场由外部阴谋与内部非理性因素共同引发的、充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。

颠覆性的核心证据来自现场目击者。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当时作为翻译和医生，全程随驾参与了皇十八子的救治。他的记录清晰地表明，在整个行程中，太子不仅正常履行职责，还多次与康熙、大皇子等人商议幼弟病情，毫无异常。这直接驳斥了“冷漠”与“长期积怨”的官方说辞，证明废太子是在最后关头仓促作出的。



《北京纪事》第三卷封面

再就是，关键人物的第一反应暴露了官方叙事的脆弱性。当康熙向心腹大臣李光地提及“帐殿夜警”时，李光地竟以两个反问句大胆质疑：“您真的确定是他干的吗？一定不会错吗？”康熙的回答是沉默与悒然，显示出他自己也对此事的真实性心存疑虑。同样，与太子交往甚密的传教士纪理安则断言，所谓行刺纯属“大皇子一党”精心设计的陷害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促使康熙作出了这个看似冲动的决定？书中指出，真正的转折点是一场被《清实录》刻意抹去的“魔镇”（巫蛊）事件。根据《北京纪事》载，康熙在回京后不久，从一名太监口中得知，大皇子胤禔勾结喇嘛，埋设有名字的人偶，诅咒废太子乃至康熙本人。当康熙亲眼看到针对自己的人偶被挖出时，他既惊且怒。这一发现让他相信，自己此前对太子的“憎恨”与“失去理智”，并非本心，而是受到了邪术的操控。

由此，整个事件的逻辑链条豁然贯通。康熙废太子的直接原因，并非太子有罪，而是康熙在幼子病危、长子构陷的混乱局面下，“疑似被巫术迷惑”而作出非理性的临时决定。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何康熙在短短两个月后便力排众议，执意复立太子。

在官方记录中，复立的理由是太子“忽罹暴戾狂易之疾”且已痊愈。传统观点视此为政治借口，但作者认为，这恰恰是康熙的真实心声——他所谓的“病”，正是被巫术所述的状态；而“病愈”，则是在一场由喇嘛主持的、被正史删削的“驱魔”法事后，恢复了清醒。

作者利用未被雍正朝史官审查的第三方史料，成功解构了官方正史的权威叙事。书中用递进的推断得出结论：康熙废太子并非一场基于理性判断的政治清算，更像是一场在权力、亲情与迷信等多股因素交织下酿成的宫廷悲剧。

历史的真相，往往就隐藏在那些被胜利者视为“有伤体面”而刻意抹去的细节之中。

再如，太子被废后，官方正史中道貌岸然的皇四子，因设计害皇八子而遭到康熙当众鞭打。而正史实录中，却被打的人篡改成了皇十四子——当初皇四子自己失败的夺嫡阴谋，在正史中被转嫁到了另一位竞争对手皇十四子头上。传教士的记录也佐证了一些原先孤证的历史记录，譬如朝鲜使臣曾在《燕行录》中记载，康熙帝在与群臣讨论复立太子的御前会议上，曾动手“殴曳”内阁大臣马齐，这在官廷传教士的记录中同样有记录：“（康熙）一拳把马齐打倒在地。”这场在君臣间上演的全武行，并非仅仅是宫廷八卦，而是从细节上证实了康熙朝皇权的限度和君臣关系。

“循理守分”的“隐士”？

围绕太子被废，还有诸多历史谜团等待解密。譬如，太子的叔外祖父索额图倒台系康熙朝之大事，与太子被废有密切关联。限于史料，学界对索额图倒台的来龙去脉并不

清楚，多认为与其和明珠的党争及助太子潜谋大事有关。本书利用汪景祺的《西征随笔》，认为索额图倒台与高士奇有关。高士奇本在索家任幕僚，索额图将之推荐给康熙，高士奇因之迅速跃升为康熙御前近侍的功臣。但索额图对高士奇始终“以奴视之”，甚至令其“长跪启事”。故高士奇怀恨倒向明珠，并在1703年陪康熙南巡回京后举报索额图，康熙将索额图关入宗人府。结果高士奇离京后神秘去世，康熙怀疑此事与索额图有关，将其迅速提审。

本书勾连起高士奇挚友，同在南书房入值的王鸿绪所追查的拐骗苏州女子案。拐卖妇女案自伊始便牵连一众官员，而追究到最后，幕后黑手竟是“御前第一人”。根据种种迹象，作者推断为太子。王鸿绪所查案件涉及满人上层异于常人的生活取向，而太子很可能深陷其中，康熙对此痛心疾首。作者推断太子此癖来自索额图。加之太子精神癫狂，且长醉不醒，都令康熙难堪愤怒，后者痛斥索额图为“我家之罪魁”。

而雍正帝在正史实录中的篡改，将“我家之罪魁”之“我家”，改成“本朝”，太子废立的家事就上升为本朝天下大事，有意扶立太子的索额图则变成“本朝第一罪人”。至于雍正本人，史官必须将其刻画为“循理守分”的“隐士”形象。因此，雍正虽系张明德案的始作俑者，但《清实录》不得不将之替换为大皇子胤禔，并归为皇八子党，且留下许多逻辑漏洞，无法解释随后群臣对皇八子明目张胆的推荐。此外，传教士记录康熙亲口说过皇八子问题在于“武”不足，但由于雍正之“武”更弱，故史官刻意制造康熙喜好恬静之人的假象。

当然，证据要组成链条，才能指引核心事实。一个值得审慎考量的问题随之浮现：《北京纪事》的写作初衷并非系统记录清廷政治，而是作为传教士向罗马教廷汇报中国传教事务的内部文献。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时激烈的“中国礼仪之争”背景，尤其涉及教皇特使来华与康熙帝的冲突。纪理安等传教士的观察视角，天然带有宗教与教派立场的滤镜。



纪理安墓碑

正如作者在之前的力作《康熙的红粟》中所论证的，传教士在康熙朝后期深度卷入皇子政治网络：他们耗费三十余年经营与太子胤禛的密切关系，并策略性地与皇八子胤禩、皇十四子胤禵等人建立联系，唯恐与最终继位的皇四子胤禛关系疏远甚至紧张。这种结构性的亲疏格局，是否可能影响他们在记录相关事件时的立场，判断乃至取舍？换言之，《北京纪事》虽为“第三方”记录，却并非价值中立的客观镜像，其叙述同样可能受到传教士群体自身利益、情感倾向及对不同皇子政治前景预期的影响。

这一疑问，恰是历史研究中难以回避的复杂性所在。因此，本书的启示不在于宣称发现了“唯一真实”，而在于示范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阅读方法论——将正史视为需被交叉质询的“权威证人”，将沉默、删节、措辞变异视为“不利证据”，将曾经的边缘文献当作“潜在线索”。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。剥开历史的“洋葱”，其核心更值得读者深思：权威叙事的建立，是否源于纯粹理性或客观真实？

读书单

《东行漫记：大师、军阀、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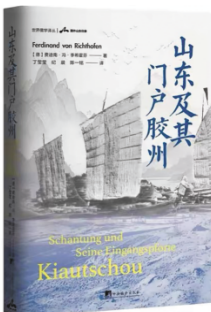
邹德怀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1926年，瑞典王储古斯塔夫·阿多夫访华，陪同者拉格雷斯收集的照片集为王储的行程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作者重金购藏这批手档案，一段尘封百年的中外交涉秘史得以重现。全书以王储视角切入1926年军阀混战、北伐兴起的“复杂中国”，通过其在北京、山西等地的文化考察，串联起故宫、长城、天坛等古迹的沧桑变迁，涉及与梁启超、梅兰芳、阎锡山等名人的交往细节，以及周口店“北京人”化石公布等重大事件，呈现一幅近代中国风云突变之际的社会图景和人物群像。作者结合严谨考证，深入挖掘瑞典王储此行相关的历史背景、学术交往、中瑞两国文化交流情况以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，辅以种种奇闻趣事，使读者直观、沉浸式地了解那段历史。



《山东及其门户胶州》

[德]费迪南·冯·李希霍芬 著
丁莹莹 纪晨 陈一铭 译
中央编译出版社

本书首次出版于1898年，系作者在多年游历、考察山东的基础上，充实地著《山东概要》一书写成的。全书共分七章，从多个维度详细介绍了山东及胶州的地质地貌、自然条件、气候矿产、交通经济、风俗物产等，是19世纪有关山东最重要的德文著作，为研究山东近代经济、教会、教案、义和团运动起因等问题的重要资料。作者提出胶州湾“可以作为未来一个经过扩建的铁路网的滨海终点”等论断，成为德国政府最终将胶州湾为其租借地的重要理论依据。



《安定心：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》

姜涛 著
中信出版集团
自1993年行医以来，作者亲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、匮乏到逐渐开放、走向科学的转变；也陪伴无数人走过精神困顿幽暗的角落。精神病院不仅是治疗之地，也是一扇窥见社会的窗口，透过它，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。本书不仅是一部精神疾病的科普书，更是一段医生与患者彼此守望的心灵旅程。它告诉我们：精神疾病并不可怕，它和其他疾病一样，可以识别，可以治疗；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，真正的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。
(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)



我与书的故事

跟着《荀子》学读书

□ 胡海洋

作为一名初探学林的青年学者，整理书架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当手划指过那一摞摞翻得卷边、纸张泛黄的《荀子》注本，心里觉得格外踏实。看着这一本本带着时光气息的书卷，思绪被迅速带回了2019年，从硕士时代的懵懂，到博士阶段的焦虑，再到如今在孔子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的沉潜，它们已陪伴我走过了七个年头。书页间密密麻麻的批注，不仅是知识的记录，更是自己求索与成长的路径历程。在这个阅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，重读《荀子》，让我对“读书”这件事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。

《荀子·解蔽》篇中有一句名言：“精于物者以物物，精于道者兼物物。”初读时，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治世的智慧，但细品其味这其实是读书治学的精要所在。所谓“精于物”，在读书上体现为广博，是涉猎群书，博采众长，注重的是量的积累；而“精于道”即专一，是透过文字的“迷雾”，把握背后的义理，所反映的则是质的飞跃。这两者看似对立，实则构成了读书的内在辩证法则。

回顾我硕士、博士的求学历程，曾一度陷入“贪多嚼不烂”的焦虑泥潭。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，我总想面面俱到，生怕遗漏了什么。今天读这本《荀子集解》，结果书读了不少，但脑子里却像堆满了散乱的积木，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。后来，也是受到《荀子》“虚壹而静”的启发才慢慢明白，读书若无“道”之统领，就像散兵游勇，再多的知识也只是杂乱无章的碎片。

于是，我开始试着做减法。我决定将《荀子》作为我的“道”，以此为锚点反复精读。从王先谦的《荀子集解》到梁启雄的《荀子简释》，再到李涂生的《荀子集解》……我一本本地钻研，试图在历代注疏的对话中梳理出荀子思想的内在脉络。这种“专一”并非画地为牢，而是如荀子所言的“壹于道”：只有先立住脚跟，拥有一套稳固的方法论，才能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术观点时，拥有“兼物物”的统摄力。

荀子讲“学不可以已”，也讲“善假于物”。在我的读书心得中，这“假物”便是利用广泛的阅读来印证和丰富我的研究。当扎得足够深，再去阅读其他诸子百家或现代学术著作时，便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，而是能主动地审视、比较、取舍。我开始明白，专一不是狭隘，而是深度。正如荀子所言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，只有钻得深，才能看得远。有了深度、广度才有了根基，否则所谓的广博不过是浮光掠影。

如今，我更加坚信，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累积，更是心性的磨砺。荀子说要“化性起伪”，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完善自我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或许更需要这种“锲而不舍”的定力，更需要分清什么是“道”，什么是“物”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读书的终极目的不是成为行走的图书馆，而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，安顿身心，见天地，见自己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？请用千字左右，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
投稿邮箱：dazhongribawt@163.com



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

后来，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，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的合影——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，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。在一次专题演讲中，我提及这幅照片：“联大人贫困，可人不猥琐，甚至可以写‘器宇轩昂’，他们的自信、刚毅与聪慧，全都写在脸上——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。”今天的中国大学，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，都正朝“世界一流”飞奔，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、干净与自信的合影——那是一种由内而外、充盈于天地间的精神力。

战火纷飞中，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、抗争、发展，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。历朝历代，凡狼烟四起时，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；只有当战乱平息，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。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“衣冠南渡”，就其实际效果而言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、文化及科技的转移，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所计划、成建制、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。抗战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，还能弦歌不辍，乃中央政府、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古代中国没有，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——那是因为，美国远

在天边，不太受战火影响；英国虽被轰炸，国土未遭入侵；法国全境被占领，大学无处可迁；唯有苏联，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。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（以莫斯科大学为例，1941年10月迁离危城，1943年春胜利回归），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，不但未被战火摧毁，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，催生出众多美好的“故事”与“传说”。

抗战中，大批中国大学内迁，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，赓续文化命脉，培养急需人才，开拓内陆空间，更重要的是，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。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，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，“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”的西南联大等，也算是“别有幽怀”。

我曾提及：“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，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，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。不过，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，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、多闻阙疑的风格。我说过，在中国，争辩教育得失，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，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。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，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，即不够专业，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。”因专业背景的关系，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

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，最为拿手；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——思考不见得周全，但洞见还是有的。至于中间这一块，我之所以选择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”，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。

说起来，关于“战争中的大学”这个题目，我酝酿了好长时间，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，不太能端上台面，只好任其散落各处。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，是1997年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《中古文学史论》所撰跋语，其中提及：“南渡的感时伤世，魏晋的流风余韵，配上稗史的师心使气，很容易使得感慨深远的学子们选择‘玄学与清谈’。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六朝的优秀著述，当与此‘天时’地利’不无关联。”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，“南渡”既是学术对象，也是文化氛围，更是精神传统——时至今日，我仍坚持这一发现。另外，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，既充分肯定其业绩，也不盲目拔高，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，如此观察与评论，兼及政治史、学术史与教育史，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，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。

（本文为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（增订版）绪言，有删减）

□ 陈平原

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《阅读史》中的一幅照片：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，很多房子倒塌了，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，墙壁也已倾斜，地下满是砖石，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，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。这固然是对抗厄运、坚信未来，但也不妨解读为：“阅读”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，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。

